

◎ 朱栋霖 范培松 / 主编

苏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 / 主办

ZHONGGUO YASU WENXUE YANJIU

中国 雅俗文学研究

第二——三合辑

东吴之人文学术传统 / 面向新的百年来中国文化史 / 黄人及其著作述略 / 幽默散文：以丑为美 / 论新文学家对现代通俗文学的评介 / 略论欧洲华文文学的发展 / 身体的诱惑：塑造当代中国的民俗电影

上海三联书店

苏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 / 主办

ZHONGGUO YASU WENXUE YANJIU

中国 雅俗文学研究

第二—三合辑

朱栋霖 范培松 / 主编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雅俗文学研究. 第二~三合辑/朱栋霖等主编. —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11

ISBN 978-7-5426-2901-2

I. 中… II. 朱… III. 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7665 号

中国雅俗文学研究(第二一三合辑)

主 编 / 朱栋霖 范培松

责任编辑 / 杜 鹏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sh.cn

印 刷 /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

版 次 /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900 千字

印 张 / 35.25

ISBN978-7-5426-2901-2/I·399

定价:68.00 元(共二册)

【名家访谈】

- 坚持本义,守正创新——温儒敏教授访谈(温儒敏 张晓玥)..... 1

【林语堂研究特辑】(栏目主持 范培松)

- 林语堂与北京文化(王兆胜) 10
驳杂与秩序——林语堂散文的另类解读(吕若涵) 23
西洋杂志文在战时中国的传播与影响(黄科安) 31
从“幽默”到“闲适”——小品文中的林语堂(朱红梅) 38

【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研究】(栏目主持 汤哲声)

- 在中国传统文化规约下的生命“追寻”主题
——论张恨水小说的文化思想价值(谢昭新) 45
中国警察影像纪实的美学特征
——两种视角的考察(彭耀春) 51
网络时代的手机短信文学(陈南先) 58
在模式中感受趣味与愉悦
——“红色经典”小说的俗化特征描述(韩颖琦) 63
浅谈近现代通俗文学期刊的广告叙事与文学叙事
——以《小说世界》1923年1月第1卷第1期为例(胡明宇)..... 70
民俗类型与现代通俗小说中的市井文化风俗(周东华) 76

【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特辑】(三)(栏目主持 朱栋霖)

- 中国现代文学中古典主义思潮的历史定位(俞兆平) 83
现代性困惑、焦虑与质疑
——三维视角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宋剑华) 92
论现代文学期刊与现代文学研究(刘增人) 101
文学史编纂的结构性矛盾与陷阱(方长安) 105
现代新儒家诗学建构的意义(侯 敏) 108
从书面范式到口头范式:民族解放洪流中的文学迁移
——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趋势及成因(赵黎明)
..... 115

【中国话剧百年】(二)

- 新剧研究文献总目(下)(顾文勋) 122
卞之琳的《哈姆雷特》(张 蕾) 158

【现代小说叙事研究】(栏目主持 刘祥安)

- 乡土叙事的现代性转型——从“商州”系列到《秦腔》(陈发明) 165

转型期的惶惑——《秦腔》与中国乡土文学的精神(张晓明)	172
参差对照——张爱玲《倾城之恋》的文本与电影(陈淑贞)	181
小说情节结构的民族“基因” ——论金庸《天龙八部》情节结构艺术(李定春)	186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栏目主持 王 尧)	
流放与超越:星星隐喻下的现代诗人 影像([美]奚密著,宋炳辉、奚密译)	192
《喜宴》:一个文化沟通的成功个案(黄治平)	206
“超文本”与“互文性”:科技与文学的沟通(谢家浩)	214
【新诗研究】(栏目主持 陈子平)	
论中国新诗的民族民间诗歌资源(许 霆)	219
传统:百年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关键词(李 怡)	228
1940年代:新诗批评视野中的穆旦(子 张)	233
对1990年代诗歌“祛魅”书写的学理反思(王昌忠)	239
“文学革命”的余波 ——重评1919年《晶报》与胡适关于白话诗的论争(李国平) ...	244
内质变迁下的词根写作——论王小妮的诗歌(杨雄林)	250
【鲁迅研究】(栏目主持 汪卫东)	
也谈鲁迅与尼采 ——以鲁迅与高长虹、徐诗荃的交往为例(廖久明)	259
晚年鲁迅的生命状态(衡相锦)	266
为《秋夜》着色(田朋朋)	271
稿约	277

坚持本义, 守正创新

——温儒敏教授访谈

温儒敏 张晓玥

张:温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访问。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这30年也是现代文学研究复苏与转型的30年。您作为新时期首届研究生,是这段历史的重要参与者,能否首先就您个人的学术道路谈些感受?

温:时间过得真快,一晃,都30年了。说到现代文学研究,的确受惠于改革开放与80年代的思想解放。作为一个学科,虽然在此之前已经奠定了基础,但真正具有学术独立性,而且形成规范,还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回头看,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有些幼稚,但无可否认,那是一个学科自觉的时期,是富于理想、自信和激情的时期。时代突变带来的那种“精神松绑”的快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事业心,以及对久违了的学术的向往与尊崇,都在现代文学学科的重建上得到痛快淋漓的表现。80年代的学者突然变得那样成熟和自信。他们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痛快而尽情地表演,比较充分地做完了当时条件下可以完成的工作。他们的思考与努力促使80年代后期诞生了一批可观的成果,包括当代文学研究成果。作为过来人,我是很感激那个时代的,我们这一代学者很多人都有过艰难的岁月,但又真的很幸运。最近我出版了一本随笔《书香五院》(北大出版社2008年5月版),其中部分回忆了80年代的北大生活,多少呈现了当时的氛围。不一定说是在“见证”那段历史,而是勾起对自己学术历程的回顾,有些念旧了吧。

张:那就说说您年轻时的读书生活?

温:我1978年考上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才开始接触专业,那一年我32岁,是个老“童生”了。那一届还有钱理群、吴福辉等师兄,比我还要大五六岁。我大学本科二年级就碰上“文革”,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但当时“停课闹革命”,还是有“逍遥派”的缝隙,加上曾有两年我到天安门东侧的历史博物馆参加“毛主席去安源”展览工作,东冲西撞地“杂览”群书,读各种中外文史著作,积蓄了一些思考,这对后来治学是个铺垫。“文革”毁灭文化,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个人阅读思考的空间。你们可能不知道,“文革”时期系统整理出版了二十四史,还有许多西方现代作品都组织同步翻译,说是内部发行,可是发行量也在五六万以上。像《麦田守望者》、《多雪的冬天》、《第三帝国的灭亡》、《拿破仑传》、《西方哲学史》,等等,那时我都想办法找来读过了。和那种目的性非常强的“职业性阅读”比起来,当初这种“漫漶而无所归心”的“杂览”,似乎更能积淀下来,形成自己的思维与写作的能力。这种习惯延续到后来上研究生,专业指向性较强了,但读书的面仍然很宽,数量很大。很多“理论刺激”可能都是来自这些“偏旁”的读书。现在我指导研究生,除去专业训练,也主张有些“杂览”,知识面尽量宽一些为好。一上来就直奔主题,想着如何考试,如何拿学分与完成论文,或者就是顺着导师的路子走,关注面太窄,是不利于积

累后劲的。

张：你们这一代的生活历练都是比较丰富的。

温：的确如此。我们这一代如果说有“优势”，那就是人生历练多一些，与学问比较紧密联系，不是两张皮。我大学毕业后曾经在广东韶关地委机关工作过8年，大多数时间都下乡下厂，当过“生产队长”，耙田、插秧什么活儿都干过，对“国情”和“民情”是有切身体验的。这种切身体验是别人代替不了，书本也难以提供的。如今我在北京生活几十年了，一到变天，几乎本能地就会惦念南方农村是否受灾。我知道理论与实践会有距离，某些“可爱”的设想落实到社会生活中就可能是“不可行”的。这种人生历练与体验，对自己做学问肯定有影响。作为知识分子，自然以脑力劳动为主，一般都比较自信与偏执，如果有过较多的人生阅历，特别是基层的生活经验，就可能会“调和”一点，有时会反躬自问，怀疑自己的角色定位可能遮蔽什么，思索自己的学问是否脱离实际。我觉得人文学者最好还是有些社会实践经历，经过自己体验的东西和只是书本上得来的会有某些比较与交融。我们那一代学者，一般都不是毛主席批评过的所谓“三门干部”（即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他们比较接触社会，是带着浓重的人生体验进入学术研究的，做学问往往有自己生命的投入，不全是为稻粱谋，事业心和使命感也比较强。我知道自己的局限，外语水平不够，传统之学的底子不厚，和新一代学者比，又可能方法比较单一，眼界不够开阔，等等。我自知不可能在学问上成就大手笔，不过顺着自己的路子来做，尽量做好就是了。

张：你们是改革开放之后，入学的第一届研究生，后来你们之中出了许多有成就的学者。能说说你们当时是怎样进入学术之门

的吗？

温：80年代思想解放，各种思潮汹涌，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但作为研究生学习，我们是比较扎实的，也比较静心，外界没有很多干扰，是一生非常难得的一心问学的好时光。那时课不多，不用攥学分，不用考虑什么核心期刊发表几篇文章，主要就是自己看书，寻找各自的兴趣点与可能的发展方位。那时也较少考虑毕业后找什么样的工作，起码不像现在那么焦虑，不会刚入学就打赚钱的算盘。这种自由宽松的空气，很适合个性化的学习。老师要求我们主要就是读书，熟悉基本材料，对现代文学史轮廓和重要的文学现象有大致的了解。也没有指定书目，现代文学三十年，大部分作家代表作以及相关评论，都要广泛涉猎。我们把王瑶文学史注释中所列举的许多作品和书目抄下来，顺藤摸瓜，一本一本地看。我被推为研究生班的班长，主要任务就是到图书馆借书。可以直接进入书库，一借就是几十本，有时库本也可以拿出来，大家轮着看。研究生阶段我们的读书量非常大，我采取浏览与精读结合，起码看过一千多种书。许多书虽然只是过过眼，有个大致了解，主轴就是感受文学史氛围。看来所谓打基础，读书没有足够的量是不行的。书读得多了，旧期刊翻阅多了，历史感和分寸感就逐步形成了。

读书报告制度那时就有了，不过我们更多的是“小班讲习”，有点类似西方大学的Seminer，每位同学隔一段时间就要准备一次专题读书报告，拿到班上“开讲”。大家围绕所讲内容展开讨论，然后王瑶、严家炎等老师评讲总结。老师看重的是有没有问题意识，以及材料是否足以支持论点，等等。如果是有比较见地的论点，就可能得到老师的鼓励与指引，形成论文。这种“集体会诊”办法，教会我们如何寻找课题，写好文章，并逐步发现自己，确定治学的理路。记得当时钱理群讲过周作人、胡风和路翎，吴福辉讲过张天翼与

沙汀,凌宇讲过沈从文和抒情小说,赵园讲过俄罗斯文学与中国,陈山讲过新月派,我讲过郁达夫与老舍,等等。后来每位报告者都根据讲习写出论文发表,各人的学术发展,可以从当初的“小班讲习”中找到源头。

导师的影响很大。我们的导师王瑶先生的指导表面上很随性自由,其实是讲究因材施教的。我上研究生第一年想找到一个切入点,就注意到郁达夫。那时这些领域研究刚刚起步,一切都要从头摸起,我查阅大量资料,把郁达夫所有作品都找来看,居然编写了一本20多万字的《郁达夫年谱》。这在当时是第一部郁达夫年谱。我的第一篇比较正式的学术论文《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也发表于王瑶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研究郁达夫这个作家,以点带面,也就熟悉了许多现代文学的史实。王先生对我这种注重第一手材料、注重文学史现象,以及以点带面的治学方式,是肯定的。当《郁达夫年谱》打算在香港出版时,王先生还亲自写了序言。

硕士论文写作那时很看重选题,因为这是一种综合训练,可能预示着学生今后的发展。我对郁达夫比较熟悉了,打算就写郁达夫,可是王先生不同意。他看了我的一些读书笔记,认为我应当选鲁迅为题目。我说鲁迅研究多了,很难进入。王先生就说,鲁迅研究比较重要,而且难的课题只要有一点推进,也就是成绩,总比老是做熟悉又容易的题目要锻炼人。后来我就选择了《鲁迅的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做毕业论文。这个选题的确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对我后来的发展有开启的作用。研究生几年,我还先后发表过《试评〈怀旧〉》、《外国文学对鲁迅〈狂人日记〉的影响》等多篇论文,在当时也算是前沿性的探讨,都和王先生的指导有关。

新中国建立以来,各种政治运动不断,土改呀、“四清”呀、“文革”呀,等等,大学很少能完整学完的,到现在,自由度大了,可是物欲

膨胀,竞争加剧,干扰也不比以前少。倒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能够比较静心学习的难得的时期,我们幸运赶上了。应当说研究生三年,加上后来做博士论文几年,是很专心问学的,为我后来的学术发展打下比较好的基础。

张:您的著作不是很多,但几乎每一种出来都有很大影响,特别是批评史和学科史的研究,受到学界的推重。您能谈谈几种主要著作的写作情况吗?

温:我学问做得比较杂,面也比较广,早年还关注过比较文学,因为这是“交通之学”,我自感外语不灵,后来“洗手不干”了。多年来我的用力主要在文学思潮与文学批评,然后就是学科史和语文教育研究。硕士论文写的是鲁迅,那个阶段还研究过郁达夫等作家,偏重于作家作品个案探讨。留校任教后发现鲁迅、小说、诗歌、戏剧等都有老师在做,那我就“填补空白”吧,选择做思潮与理论批评。这也是工作需要。我的博士论文《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就是研究思潮的。那是1985年,论文选题还举棋不定呢,我一开始并不打算做思潮,想往鲁迅靠。但那时我对比较文学有些兴趣,为参加全国首届比较文学会议,写了一篇关于五四现实主义与欧洲思潮关系的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王瑶先生认为还可以,也适合我的理路,就建议我还是写现实主义思潮。这可是个大题目。当时文坛正在呼唤回归现实主义,许多文章都在说这个问题,但是它的来龙去脉不见得很清楚,梳理一下是必要的。我就选择了这个难题。如果铺开写,等于是半部文学史了,很难把握。于是决定先“清理地基”,把现实主义思潮发生、发展与变化的基本事实呈现出来。我找到一个当时还较少使用的词叫“流变”,一下子把思路点亮了。下来的工作就是大量收集整理材料,然后以史述为主,从繁复的文学史现象中选择一些最突出的“点”,去把握

数十年间现实主义思潮衍变的轨迹,其成为主流的原因,以及它对新文学所起的推进或制约作用。现在看来这篇论文写的还是平,但那时关于思潮流派系统研究的专著还很少,这是第一部叙写现实主义思潮史的著作,等于开了风气之先,颇受学界的注意,很快翻译到韩国出版,还被日本某些大学选作教材。80年代后期许多博士论文大抵顺着这个趋向,以思潮流派的梳理作为题目,出了一批殷实的作品,比如研究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派、左翼文学思潮,等等。

我的第二本专著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1993年)。如果说前一本博士论文的写作还有些顾忌,要考虑如何通过答辩,那么这本批评史倒是比较放得开,也比较精心的。那是1990年前后,我给学生开批评史的课,意在接续古代文学批评史。当时北大搞古文论的有三四位专家,可是没有人关注现代文论,现代文论给人的印象似乎学术“含金量”不高。别的大学大抵如此,当时各种文体与作家研究专题课都有人讲,就是很少有人专门研究现代批评。我心想古代文论研究当然重要,但是现代文论也已经形成新的传统,对当今文学生活有弥漫型的影响,所以清理现代文学的理论批评,也应当是重要的课题。我上现代批评史这门课,带有些草创的性质。为了实际的教学效果,我另辟蹊径,不面面俱到地总结所谓规律,也不注重系统性,而是选择了十多个比较重要的批评家做深入探究,让学生领略不同的理路方法,观千剑而识器,提高文学评论的能力。当时批评史研究的基础研究还那样薄弱,我讲授每一位批评家,都要从头做起,进行“打井”式的研究,非常费功夫的。不过一两轮教课下来,我积累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更重要的,是研究的现实感强了,问题意识突出了。我的批评史研究也许并不全面,但现实的指向性明显。我意识到在现代文学研究格局中,理论批评是非常重要的,是贯串性的,置身于当代文学批评的氛

围,仍然能强烈地感受到以往那些批评家根须的伸展,我们要是认识当今所讨论的许多文学命题,也能从以往的批评家那里获得某种批评传统的连续感。后来花了两三年时间,才在讲稿基础上写成了这本批评史。讲课时涉及的批评家比现在书中多一些,包括鲁迅、钱锺书、闻一多都曾讲到,但出书时只集中论述了14位。和前一本专著一样,“论”的成分比较多。那时我很痴迷于韦勒克的文学理论,受他的影响,不刻意勾勒历史链条或者什么规律,而是重点论说最有理论个性和实际影响的批评家代表,注意他们对文学认知活动的历程,以及各种文学认知在批评史上所构成的“合力”。这本书的确下了“笨功夫”,也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至今仍然是现代批评史研究中引用率最高的一本。

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2005年),也是我多年来给研究生讲课的产物,我带着一些年轻学者共同完成了这本书。目的是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做一回顾评说,后来发现有些吃力不讨好,因为距离还不可能充分拉开,要品评学术,难免顾此失彼,甚至“得失人情”。但这个工作还是很有意思,对于学生的学术训练尤为必要。让学生能尽快入门,获得更专业、更有学术自觉的眼光,就要领略各个阶段种种不同的方法理路,从学科评论的高度,了解现代文学研究发生发展的历史、现状、热点、难点以及前沿性课题。这等于在展示一张学术“地图”,研究者可以从中了解和测定自己的方位,起码可以从中获取某种学科史评价的信息。该书原是给研究生写的,因为论涉整个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并引发诸多新鲜的话题,也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值得欣慰的是,一些大学现在也开设学科史这类选修课了。迄今我出版有八九本书,比较尽力的也就是这两三种。不过有些论文集如《文学史的视野》、《文学课堂》、《语文课改与文学教育》,等等,收录了我专著之外的许多论文,也呈现我多年来问学燕园

的脚印。

张:您参与写作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新时期以来影响巨大的著作。很多学校选作教材,大家对它的写作过程可能有兴趣,能说说吗?

温:《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我和钱理群、吴福辉学兄合作的,因为用作教材,大家都比较熟悉。说来有点意思,这本书成稿于1985年前后,是王瑶先生建议我们合作编写的,当时参加者还有王超冰。初稿在并不起眼的杂志《陕西教育》上连载,并没有多少影响。后来我们认真修改过一遍,准备正式出书。我就代表4位作者和北大出版社联系,很遗憾,没有通过,退稿了。想来那时我们几个都还只是讲师,写教材似乎不够资格的,而出版教材的确又是非常慎重的事,怪不得出版社拒绝。我们又另找门路,就找到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方面接纳了稿子,出版了,居然还印刷五六次,颇有些影响。1997年我就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后,打算大力扶持教材,就想到这本《三十年》,提议加以修订,拿回北大来出版。我们在香山宾馆住了一个星期,拟定了修改框架,然后三个人分工,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对原书做了很大修改,几乎就是重写了。我们是考虑作为教材来写的,保持文学史知识的某些稳定性,但也很放得开,充分吸收学术界新的成果,加上我们自己的研究心得,所以“论”的色彩也是比较浓,每个人的写作风格还不尽相同,人称是专著式教材。它在史述中引发的话题很多,留给读者思考的空间也比较大,不是本科生一看就懂的那种教科书,不过,有些“张力”反而会好些,老师讲课自然可以发挥,除了本科教学,不少学校还指定它为研究生考试参考。1998年该书修订本出版后,被教育部指定为“九五”全国重点教材,至今已28次印刷,印数近70万,还获得行内看好的“王瑶学术奖”。这本教材出版10年了,有些明显的不足,比如某

些章节安排不太平衡,也有一些错漏,应该打算修订了。

张:您认为现代文学研究有哪些今天特别值得珍视的经验与传统?

温:你这个题目很大。前年召开第九届现代文学学会的年会上,我提交的论文是《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发表于《文学评论》2007年2期),其中谈到对当前研究中出现的某些趋向与问题的看法,包括学科的“边缘化”与“汉学心态”,文学史研究中的“思想史热”,“泛文化”研究的缺失,以及“现代性”的“过度阐释”问题,等等,也有你说的如何看待过去研究的“经验与传统”,这里就不再展开来说了。我只想特别提到,现代文学这个学科有两个特点很突出,一是和现实结合紧密,二是和教学结合也紧密。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革命“修史”,现代文学自然受到重视,地位很高。80年代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现代文学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几乎成为“显学”。好处是每一阶段都受到格外重视,集合了一批实力强的学者,对社会影响也大。这形成了现代文学研究富于现实感的特色。现代文学也从社会的格外关注中获得理论资源与学术冲动,使这门学科能够和时代息息相关,始终比较有生气。当然,过去这门学科和政治关联太过密切,甚至受政治的过分支配,丧失了学术的自主性,给学科发展造成很大伤害。直到80年代之后,才逐步恢复了学术自主及规范。我觉得关注现实是现代文学研究的特色,也是重要传统,是学科发展的动力,这些年多少丢掉了传统,变得越来越拘泥、小气了。实在有些可惜。另外一个传统是和教学的结合。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奠定了学科基础,这本书就是教材,是教学的产物。80年代学科复苏,首先出现有分量的成果也大都是教材。是教学在不断推动这门学科发展,而且教学的需要也影响到学科的格局。但是这些年来我们对于

现代文学教学的关注是很少的。每年召开各种类型的学术会议很多,关注教学的能有几次?这也无奈。现在几乎多数学校都奔着“研究型”方向发展,老师晋升和考评都主要看发表文章,很少有精力放在教学上了。这是很大的问题。

张:您提出要警惕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在学界反响较大,也有一些争论。您能否就这个问题再发表一些看法?

温:我的主要观点都在《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原载《文艺争鸣》2007年7期,同年《新华文摘》20期转载)那篇文章中表述了。后来有些反响,也有不同的意见。首先我不是针对海外汉学来说的,我一直认为汉学很重要,汉学家一般都做得深入专注,往往“穷尽”某一课题。汉学家的研究主要是面向西方读者的,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也就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而以西方为拟想读者的汉学,也可以作为我们观察研究本土文化的“他者”,是可供本土学科发展借鉴的重要的学术资源。但借鉴不是套用,对汉学盲目崇拜,甚至要当作本土的学术标准或者摹本,这种心态并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我提出警惕所谓“汉学心态”,主要是针对文学研究中空泛的学风,并非指向汉学。千万不要理解成我是在“反击”海外汉学。我们完全可以也应当与海外汉学同道们开展平等对话。我主政北大中文系这些年,每学期都邀请几十位汉学家来北大讲学,就是为了交流与对话。

我说的所谓“汉学心态”主要表现在盲目的“跟风”。这些年来,有些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和评论家,甚至包括某些颇有名气的学者,对汉学,特别是美国汉学有些过分崇拜,他们对汉学的“跟进”,真是亦步亦趋。他们有些人已经不是一般的借鉴,而是把汉学作为追赶的学术标准,形成了一种乐此不疲的风尚。所以说这是一种“心态”。人文学科包括文学

研究,其中民族性、个别性、差异性的东西可能很重要,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把西方汉学成果拿来就用,甚至就以此为标准,为时尚、为风气,心态和姿态都和海外汉学家差不多了,“身份”问题也出现了。许多“仿汉学”的文章,看上去很新鲜、别致,再琢磨则有共同的一个毛病,就是“隔”,缺少分寸感,缺少对历史的同情之理解。而可笑的是有些“仿汉学”的文章并不掩饰其“仿”,连语气格调都像是翻译过来的,可以称之为“仿译体”。汉学的套路并非不可借用,但总还要有自己的理解与投入,有自主创新,而不是简单克隆。所谓“汉学心态”,不一定说它就是崇洋迷外,但起码没有过滤与选择,是一种盲目的“逐新”。我主要是针对学风而言,带有学术反思的意思。有些学者没有领会我的本意,以为我是搞闭关锁国,排斥外来的东西,这就把我的观点拧了。我主张尊重汉学,引进汉学,研究汉学,但不宜把汉学当成本土的学术标准。我们可以借鉴外来的学问,但是问题的发现、问题的建构和方法的选择,应该建立在自己扎实研究的基础之上。现在有所谓“汉学心态”,其实是缺乏学术自信的表现。

张:您在不止一篇文章中提到要重视文学研究的本义,重视文学教育和审美教育,并对文学研究远离审美表示焦虑。您到底怎样认识现在这种趋势?有什么深层的背景吗?

温:现在文学研究不太注重文学自身,存在以思想史、文化史研究取代文学研究的趋向,所以我提出要重视文学研究的本义。那么本义是什么?可能有不同的解析。我认为起码审美的研究是比较核心的,创作的个性、独特性,也是文学研究所要重点关注的,或者说,是其他学科研究所不能代替的。文学创造是非常个人化的,是独特的想象力和语言创造力造就了各式各样的艺术世界,所以文学研究特别是作家作品研究,在许多情况下都必须发现艺术个性,也必须以经验性审美

性的分析为前提,而不能停留于大的思想背景的考察或所谓时代精神同一性的阐释。尽管具体到某一篇文章,不同的研究对象和不同的学者可能会各有侧重,但文学研究的基本特质是不应当忘记的。我这样提出问题,也是有针对性。现在常看到有些着眼于文化研究的文章,对于过去的文学史写作基本上是否定的,其中设定的观念就大都立足于批判,不承认有所谓历史的真实,认为历史都是后设的。这当然也是一种研究的角度。不过有时是先入为主,理论早就摆在那里,要做的工作不过是找到一些能够证明的文本材料,难免就大而化之。大概因为这样观点加例子的理路比较好操作,容易“出活”,所以也就比较流行。这样的风气当然也就越来越远离文学研究的本义了。

更大的问题是影响到教学。学生读了几年中文系,知道一些文学史知识,也学会用一些理论套式分析文学,但没有文学的感悟力,甚至没有文学的爱好。如果我们办的中文系没有“文气”,培养学生也没有“文气”,甚至写作都不过关,那就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现在中文系文学教育用心最多的就是文学研究,学会如何分析处理问题,以及如何写出像样的规范的文章。但“文学”的味道似乎越来越淡了。概论、文学史和各种理论展示的课程太多,作家作品与专书选读太少,结果呢,学生刚上大学可能还挺有灵气,学了几年后,理论条条有了,文章也会操作了,但悟性与感受力反而差了。的确有不少文学专业的学生,书越读审美感觉就越是弱化。翻阅这些年各个大学的本科生、研究生的论文,有多少是着眼于文本分析与审美研究的?大家一窝蜂都在做“思想史研究”与“文化研究”。其实,术业有专攻,要进入文化史研究领域,总有些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训练,然而中文系出身的人在这些方面又是弱项,结果就难免邯郸学步,“文学”不见了,“文化”又不到位,未能真正进入研究的境界。所以我担心

现在的文学教育不能改变文学审美失落的趋向。

张:过去学术研究主要受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后来又遭受物质消费潮流的冲击,而目前似乎又面临越来越严密的学术体制的约束,如核心期刊、项目申报、各种评比指标量化要求,等等。这也是新一代年轻学者面临的困境。您对此怎样看?

温:现有的学术生产体制,很不利于做学问,对于人文学科伤害更大。学术泡沫的出现跟学术生产体制是有关的。现在常见的评什么博士点呀、重点学科呀、基地呀,还有这个奖那个奖的,也许初衷是为了促进学术竞争与发展,教育和科研的规模大了,有些量化也是一种必要的管理手段。问题是如果一刀切,用理科的规范来约束文科,学术评价全都主要看量化指标,就一定出偏差。尤其是跟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类职称和岗位等级评定,大家都被迫疲于奔命去争各种学术量化的指标,都被所谓“创新”的要求所追赶,学术泡沫就这样大量涌现了。泡沫化、平面化已经消释了学术的庄严,败坏了做学问的感觉。对此要有思想准备,这种状况短时期是难以好转的。我们要正视这种情况,就当成是一种我们还难以摆脱的生存环境,要与之共存,而又尽量减少精神上受其困扰,也许这样才能在日益商业化功利化的环境中保留一份学术的尊严。不为某些时尚的标准或实利化的风气所左右,能够沉下心来做学问,与拜金主义保持必要的距离,这就是一种学者的定力。当然,对于学术量化要求,年轻学者不可能不面对,这是非常现实的,关系到许多实际利益。我们有些无奈,必须应对,只是千万不要形成习惯,以为这就是学术之正道了。不断牢骚,又不断参与,就守不住底线了。最好能保持一点平衡,给自己留一点“自留地”,也就是真正自己喜欢做的,能作为“志业”来追求的那些研究。在这个浮躁的年代,谁能潜心

学问,只要方法对路,多年后可能就有结实的成果出来,终究会得到社会的欢迎的。

张:您很关注中学和小学语文教育,在北大领衔成立了语文教育研究所,对基础教育有过许多发言。请问您为何要花许多精力做这些本来是师范院校的工作?有什么设想吗?

温:我这些年关于语文教育的一些文章,大都汇集在《语文课改与文学教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这本书里边了。语文教育是各个层次教学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面对社会转型与时代的需求,中小学语文教学正围绕新的课程标准推行变革,特别是高考内容方式的改革正在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大学语文和成人教育语文的改革也势在必行。而作为语文教育“制高点”的大学中文系,无论如何也不能对这种改革熟视无睹。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教学,而学术研究的功能之一,是要联系实际解决问题。我们在大学教中文的老师应当关注中学与大学的语文教学,中文系在整个社会的语文教育方面应当承担重要的责任。特别是现在各个大学办学的目标比较趋同,许多师范院校都力图脱去师范的特色,往研究型发展,对于社会广泛关心而又关系到民族未来的基础教育,反而缺少认真的研究。我想,自己可以利用北大的条件来做点实事情。出于这种思考,2004年我主持成立了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随后做了三件事:一是组织北大教授参与“新课标”高中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出版工作,我担任执行主编(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二是推动在全国课题招标,组织关于语文教育的十多个专题调查研究,我称之为“非指向性研究”,主要是调查和数据分析,不是常见的那种经验介绍;三是由我主持编写新型的大学语文教材《高等语文》,引发关于大学语文改革的相关讨论。这些工作不见得有多大成就,再说我们毕竟不是这些方面的专家,也就是敲

敲边鼓吧,许多方面还不尽如人意,但其意义在于“参与”。我们的工作也有一些影响,在我们推动下,原来总想削弱“师范性”的师范院校,也回头强化师范教育了,最近好几个大学相继成立了语文教育研究机构。

这几年我还被教育部指定为国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的召集人,接触中小学语文教学就更多了。我还到许多边远地区中小学听课。现在中学语文改革的争论太多,谁都在抱怨,谁都插得上嘴,但建设性可行性的意见往往得不到重视。经验总结太多,科学分析研究太少。我主张还是务实一点,回到朴素的立场,多一些调查研究,看到底社会上多数人首先要求从语文课学习中得到什么,这个定位清楚了,再来讨论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改革。针对目前课改中出现的某些问题,我提出步子稳一些为好,要考虑国情,考虑大多数学生的需要,不能只盯着大城市的重点中学,应当更多地关注多数学校包括农村一般中学的教学资源和条件。这些观点也许显得有些“守成”,但本意还是支持教学改革,希望有比较务实的姿态,改革毕竟不是目标,而只是手段和过程。

张:您最近在研究什么课题?

温:这些年我把许多精力放在清理现代文学新的传统。近百年来形成的现代文学传统,已经渗透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思维和审美方式,成为当代文学/文化发展的规范性力量。必须重视研究这个“新传统”。近些年许多关于文化转型与困扰的讨论,包括那些试图颠覆五四与新文学的挑战,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传统的问题。这种研究既是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当下的“发言”,其重要性在于通过对传统资源的发掘、认识与阐释,参与价值重建。我理解的现代文学传统不是完整的、固定的、同质性的,而是包含着多元、复杂和矛盾的因子的。因此我的研究力求走出

“本质论”，特别注意现代文学传统延传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变异、断裂和非连续性。我采纳了一个概念叫“阐释变体链”，就是要包括新传统的形成、生长、传播，以及不同时期的各种选择、提炼、释放、发挥、塑造，等等。我认为“现在”和“历史”总是构成不断的“对话”关系，正是这种“对话”使传统能持续得到更新。现在这个课题已经大抵完成，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些年轻学者如陈晓明、高旭东、贺桂梅，等等，也参加这一课题。我这些年关心的另一研究方向就是语文教育，包括语文教育的历史清理，以及当下语文教育碰到的各种主要问题。我所指导的博士生与博士后，已经有几位做这方面的研究。

张：北大中文系在全国文科领域影响很大，而您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多年，工作一定不会轻松，请问您执掌这样一个文科大系有何秘诀？

温：谈不上有什么“秘诀”，北大中文系自有其“系格”，是比较人和，也比较正气的系，这是传统，尽量保持就是正道。学术单位最重要的是人才，而真正能吸引人才，并且让大家安心做学问的，是自由思想的空气。我当系主任想方设法就是营造自由。现在学术管

理对我们也有许多要求，但我们不会管得太死。我们比较看重的是“代表作”，是真本事，是学术生长的潜力。当然，系里也有少数学问不那么出色，或者不怎么出活的，你总不能为了限制这少数人，而特别制定一个死板的条例，把整个气氛都搞得紧张吧。那就不值得了。现在全国大多数中文系都“翻牌”叫“某某学院”，当然也可能是发展的需要。按说以北大中文系现有的规模，也不是一个小学院的格局了，至今没“翻牌”，因为我们很看重“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个名字连在一起的“文脉”。我们讲文脉，讲传统，不是摆先前阔，而是要让文脉来滋养我们当前的教学研究，我提出了“守正创新”。现在，人文学科越来越受到挤压，北大中文系还能取得一点成绩，在全国同一学科中仍能整体领先，我想还是靠“老本钱”，在“守正”上下了些工夫，所谓创新仍然是要有“守正”作为基础的。我从1999年开始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至今快10年了，很快就要交班，北大中文系有自己的传统和良好风气，相信今后一定还能再接再厉，守正创新，冠冕芳林。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100871
浙江工业大学 310000）

林语堂与北京文化

王兆胜

摘要:林语堂与北京文化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可用“魂牵梦绕”来概括。林语堂欣赏和喜爱北京文化的巨大包容性、幻梦之美、自足快乐等,这构成了他世界观、人生观、文化观、文学观和审美观之根本。林语堂是站在人类文化健全的角度、中西文化融通的立场,来看待北京文化的,从而与其他中国现代作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果说哪座城市最能代表中国现代文化,人们无疑会说是上海;但要选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都市,在四大古都洛阳、西安、北京和南京中,恐怕北京是首当其冲的。这不仅因为北京现在是首都,也因为它是金、元、明、清四朝的国都,还因为历朝历代都将它作为重镇,并且它是数十万年前北京人的发源地,更因为它具有丰富的文化积淀,是一座古老的文化之城,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因此,探讨林语堂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北京文化是一个很好也是不可忽略的透视点,换言之,通过北京文化这个特殊的窗口,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和领悟林语堂与中国文化的特殊关联。

一、魂系北京

严格意义上说,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可能没有谁能与北京文化毫无关系,因为北京文化与中国近千年的历史息息相关,其文化积累也是相当深厚的。作为中国现代作家中的一员,林语堂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比较而言,林语堂对北京文化更为关注,投入的情感和心血也更多,可用“魂牵梦绕”来概括。也可以说,除了自己的家乡福建漳州,林语堂最热爱的地方就是北京。

最早踏上北京这片土地的林语堂还只有21岁,那是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到清华大学当教员。据林太乙说,林语堂来到北京,“他游北海、中南海,其中包括光绪皇帝被囚禁的瀛台。他到紫禁城观望,到中央公园,其中苍松翠柏,都是百年老树。卧佛睡在西山,玉泉喷出晶莹的泉水,还有长城、明冢,这一切都是他向往已久的古迹,住在北京,就等于和中国历史溶为一片。”^①当时在北京有三件事给林语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从火车站到清华园,一路风光无限,美不胜收。二是游长城归来,听到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他感动得痛哭流涕,并深以自己的无知为耻,于是立志补上中国文化这一课,他自言:“想想我投身中国的心脏地带北平,心里有多么惭愧。不只我的学问,还有基督教的背景。我没有机会看中国戏,中国人都从戏曲中认识中国闻名的男人和女人。我熟知《圣经》中以色列领袖约书亚的号角吹倒巴勒斯坦古都耶利哥城的故事,却不知道孟姜女曾哭倒长城。我还是大学毕业生,自以为是知识分子哩。”“我要洗雪前耻,遂认真钻研中国的学问。首先,我读《红楼梦》,学习北平口语。”^②三是开始逛琉璃厂,向旧书店的老板求教,与他们一起探讨中国古书的版本问题。从“上海”到“北京”,这

对林语堂不只是意味着“地域”变迁,更是一次“文化”移位,即从“现代”走进“传统”,由基督教文化背景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来。此时,北京虽是五四文学革命和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大本营,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激烈派全力以赴地准备反传统,但林语堂在文化形态上,却经历了与鲁迅、胡适等人相反的方向,即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抱有批判、否定和厌恶,而是深怀惭愧、喜爱和向往。这是以往论者所忽略的,因为起点的不同,即预示着今后过程甚至终点的较大差异。

文学革命爆发后,林语堂虽然受到胡适、陈独秀、吴稚晖、鲁迅思想的影响,也撰文支持口语运动,但未见其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一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是较为陌生的,二是因为他在情感上是拥抱中国文化的。在欧美数年间,林语堂也一直对中国文化怀有敬意,而在德国做的博士论文竟是《古代中国语音学》,由此可见一斑。真正改变其文化思想的是,林语堂留学归国后的事情。1923年秋,林语堂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开始以“科学”和“幽默”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文化,于是有了《科学与经书》、《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论土气与思想界之关系》等,其中批判的锋芒开始显露出来。1925年以来,由于中国政治的日益腐败,也由于参加《语丝》杂志,与鲁迅、周作人等人一起战斗;还由于西方视角的突出,林语堂在政治批判的同时,对于中国文化包括北京文化也持批评的态度,并且开始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国文化和北京文化,林语堂的态度还是有明显的不同:他没有像否定中国文化那样,对北京文化一概否定,而是有所保留的。这也许与林语堂觉得“北平经验”远比笼统的中国文化可爱有关。《谈北京》可能是林语堂第一篇专门谈“北京”的文章,其中对北京和北京文化的感情还是真挚的。

从1928年到1936年,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林语堂较少谈到北京文化,即使涉及也是

一掠而过,如《吾国与吾民》一书中,约有十几处谈到“北京”,但少有“北京文化”的提法和内容。如有一段这样写道:“北平——旧北京,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的全城规划,也有一条南北贯穿好几英里的看不见的中轴线,从前门通过皇帝的宝座,一直贯穿到煤山的中心亭台,直至后面的鼓楼。”^③即如这样的介绍也是少见的。

1936年出国是林语堂情牵北京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作为一个海外游子,林语堂不仅感到了去国的痛楚,还对曾给他美好印象的故国都市产生了浓郁的依恋之情,在随后不久发生的战争牵动了林语堂的爱国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937年,林语堂写了《说北平》一文,对北京的文化品格给予高度的赞扬,并称颂“北京是一个‘珠玉之城’,一个人眼从未见过的珠玉之城”,北京是“迷人”的。^④1939年,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中,林语堂将“北京”作为起点和主要场景,而北京文化则是作品的主脉。在《北京城人间福地 富贵家神仙生活》一章中,林语堂这样写北京:“设计这个城市的是个巧夺天工的巨匠,造出的这个城市,普天之下,没有别的城市可与比拟。既富有人文的精神,又富有崇高华严的气质和家居生活的舒适。人间地上,岂有他处可以与之分庭抗礼?”^⑤世界各国都市林立,名胜不胜枚举,但林语堂却将北京奉为首屈一指,且称之为“人间福地”,而这个城市中人则被说成是享受着“神仙生活”,由此不难看出,老北京在他心目中独一无二的形象和位置。在1940年出版的《风声鹤唳》中,林语堂也写到北京和北京文化,并对之给予了由衷的赞赏。

1961年,林语堂的《辉煌的北京》出版,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学术文化随笔,其中包括北京的四季、城市、皇宫、御苑、艺术、信仰、典故、民众生活等,可谓北京文化的百科全书。本书最有特色的是旁征博引,资料相当详尽,这在林语堂的所有著作中是少见的;另一方面,作者又不为资料束缚,而是充满生命

的激情、灵动与感悟,所以这本表面看来艰涩的著作并不难读,而是诗意盎然、美不胜收!这显然与作者对北京和北京文化的深情怀念有关。最为重要的是,林语堂在本书中表达的对北京和北京文化的崇尚之情,他说:“北京,似乎是个永不衰老的城市。当此时刻,所有西方文明的记忆都似乎从脑海中消失了,只有古代的梦化作真实的北京,在眼前迤迤展现。”他又说:“北京代表了中国的一切——泱泱大国的行政中心,能够追溯到大约四千五百年前的伟大文化的精髓。世界上最源远流长、完整无缺的历史传统的顶峰,是东方辉煌文明栩栩如生的象征。”^⑥这种对于北京和北京文化的评价是极高的。晚年,林语堂曾表示,自己最喜爱的地方是北京,而能在这座城市写作也是有福之人,然而由于政治等各种原因,他的愿望不可能实现,最后叶落归根时,也只有选择靠近家乡的台湾阳明山居住。阳明山离台北市不远,周围又是美丽的山景,但它哪能与漳州的家乡山水比美,更不能与“人间仙境”的北京相提并论,所以晚年林语堂在阳明山呆的时间并不多。还有这一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红牡丹》也是以北京文化为背景,其中的梁牡丹最后放弃了繁华的北京市内,而选择了郊区海淀与农民傅南涛结婚,这是在“乡村式都市”的文化中获得平衡的重要方式,表现了北京文化的另一特质。

林语堂尽管是南方人,但他对北京却充满母子般的眷恋,这从他抒写北京文化的文字中可以分明地感到。30年代林语堂曾写过一篇散文《秋天的况味》,其中有这样的话:

在四时中,我于秋是有偏爱的,所以不妨说说。秋是代表成熟,对于春天之明媚娇艳,夏日的茂密浓深,都是过来人,不足为奇了,所以其色淡,叶多黄,有古色苍茏之概,不单以葱翠争荣了。这是我所谓秋天的意味。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暄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陷入凛烈

萧瑟气态,这是最值得赏乐的。那时的温和,如我烟上的红灰,只是一股薰热的温香罢了。或如文人已排脱下笔惊人的格调,而渐趋纯熟练达,宏毅坚实,其文读来有深长意味。^⑦

这里虽没有直言北京,但与60年代《辉煌的北京》之写秋天如出一辙,其审美趣味和文体风格都是如此。北京的秋天尤其是初秋,是林语堂的最爱,所以它才能如此缠绵优雅地描绘和歌唱它。下面是林语堂写北京的四季:

秋天,在城南的大沼泽地里,经过整个夏季养得肥肥的野鸭,和躲藏在河边灌木丛中的苍鹭,开始了一年一次的南迁。公园和西山都泛着红、紫色。西山上红土与蓝天映衬混杂一起,产生了著名的西山紫坡景观,在更高、更远的山顶,山色渐渐变成暗紫色和灰色。^⑧

据说,出版商对《辉煌的北京》一书的“条件很苛薄”,但林语堂还是“接受了”。^⑨何以在66岁高龄,又远在美国,还要写这样一本既不会畅销也不能赚钱的书呢?那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喜欢”和“眷恋”,因为北京和北京文化已深入林语堂的骨髓和灵魂,在国外呆得时间越长,他就越加思念和热爱它。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林语堂是将北京当成中国或中国文化的象征来看待的。1936年去国前,林语堂曾专门到北京与之道别,并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这个他与鲁迅诸友20年代常常聚谈的地方——欣赏满园的古木和盛开的花朵。然而,到1961年写《辉煌的北京》时,时光已过去二十五年,这怎么能不让林语堂思情荡漾呢?更令人忧伤的是,直到1975年林语堂故去,整整四十年他再也无缘目睹北京这座城市美丽的姿容。晚年居住在阳明山的林语堂,常常临窗远眺祖国大陆,这既包括他的故乡漳州,一定也包括遥远、美丽、可